



· 16 ·

· 研究专辑 ·

齐国学术思想史

齐文学艺术史





·16·

·研究专辑·

齐国学术思想史

刘蔚华 苗润田 著

齐文学艺术史

王洲明 王培元 著

齐 鲁 书 社



BA094/05

齐国学术思想史

刘蔚华 苗润田

齐国学术思想史

PDG



目 录

序 章	7
一、齐国的由来与社会变迁	7
二、齐国的文化氛围	12
三、齐学在先秦学术史上的地位	15
第一章 姜太公的政治、军事思想	17
一、西周开国元勋，姜齐立国始祖	17
二、强国富民的政治谋略	21
三、“先谋后事”的军事思想	30
第二章 管仲的变法思想	36
一、由平民而及名相	36
二、安国、尊王与图霸的政治思想	38
三、富国、利民与兴业的经济思想	45
四、整军、寄政与强兵的军事思想	49

第三章 晏婴的政治与哲学思想	53
一、晏婴相齐及其政绩	53
二、“以民为本”的政治思想	55
三、无神论和朴素辩证法思想	61
第四章 孙武的军事思想	68
一、孙武其人及《孙子兵法》	68
二、孙武的军事思想体系	71
三、孙武的辩证法思想	78
第五章 稷下学宫	85
一、田齐政权的建立与经济发展	85
二、稷下学宫的建立与发展	87
三、稷下学宫的性质与特点	90
四、稷下学宫消亡、历史地位与影响	95
第六章 稷下诸子（一）	97
一、淳于髡	97
二、彭蒙	102
三、宋荣	105
四、孟轲	116
五、尹文	128
第七章 稷下诸子（二）	137
一、儿说	137

二、慎到·····	141
三、田骈·····	155
四、环渊·····	166
五、荀况·····	172
 第八章 稷下诸子(三)·····	191
一、季真·····	191
二、接子·····	194
三、王斗·····	198
四、颜觸·····	200
五、邹衍、邹奭·····	205
六、田巴·····	213
七、鲁仲连·····	221
 第九章 稷下文献的扩散·····	226
一、《管子》与稷下学·····	226
二、《黄老帛书》与稷下学·····	242
三、《吕氏春秋》与稷下学·····	253
四、《周礼》与稷下学·····	271
 第十章 齐国兵学的发展·····	280
一、《司马法》·····	280
二、《孙臆兵法》·····	289
 第十一章 齐国学术的历史命运·····	297

一、齐国学术在秦汉时代的沉浮·····	297
二、齐国学术对后世的影响·····	305



序 章

一、齐国的由来与社会变迁

先秦的齐国，在今山东的东北部，东临大海，西凭黄河，南傍泰山，北滨渤海，整个半岛形如一只正欲起飞的雄鹰，昂首伸向太平洋。其腹地西面与南面同鲁、宋、赵、燕诸封国毗邻，气候温暖湿润，雨水丰沛，河海之间，绿野青山，既适于农垦，又得渔盐之利，山河灵秀，物华天宝，地理环境十分优越。齐自周初建国起，至秦统一六国止，存国八百余年，一直是有周一代雄踞东方的诸侯大国。

据中国古代文献和考古资料表明，齐这块热土，早在四五十万年前，就有“沂源猿人”生息。进入新石器时代，曾先后出现了“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从大量遗址的发掘来看，这些史前文化的遗存曾有过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在商周以前，已经有稳定生息在这里的原始部落群体。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生活在齐地的原始氏族是爽鸠氏，以鸟为图腾，

这可能是凤凰崇拜的肇始。夏商时，季荊、逢伯陵、蒲姑氏先后袭居于此。晏婴曾追述过齐地的先民：“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左传》昭公二十年）这段话清楚地叙述了齐地早期的历史沿革。

在西周以前这段历史时期，我们称之为先齐阶段，这里的社会文明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①当殷商末期西方的周族在岐山一带崛起时，地处今山东淄博境内的蒲姑是殷朝的属国，成为殷商的后方。周武王灭商时，蒲姑曾参加东夷十七国联合反周，后被周公旦和姜太公率领东征大军所征服。

西周王朝建立后，为加强对全国广大地区的统治，采取了“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的分封制。形成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分封制大一统国家。在武王灭商时，姜太公为军师，是西周的开国元勋，姬姜之间又结有世代通婚的关系；因此，当周初大封功臣谋士，“师尚父为首封”（《史记·周本纪》），把海、岱之间的蒲姑故地分封给姜太公，建立了齐国^②，都营丘^③。

姜太公立国之初，齐国土面积仅有方圆百里，尚未扩及整个滨海区域，当时优越的自然条件未得到开发，土地贫瘠，人烟稀少。但因其滨临大海，有丰富的鱼盐资源，人民长于植桑养蚕，精于纺织，手工业比较发达，具有发展工商业的潜在优势。姜尚治齐后，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因俗简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等建国方策，稳定了齐国的政局，振兴了齐国的经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逐渐富裕起来，人口也随之增加，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有了很大改观。后来，几经征伐，并灭了周围一些小国，大大扩展了它的疆域。

春秋初期，齐国已发展成为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资源丰富，

农业、手工业与商业都很发达的国家。由于冶铁业的发展，齐国率先在农业生产中使用了铁制农具，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提高，并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国语·齐语》记载：“美金（青铜）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铁）以铸锄夷斲，试诸壤土。”在临淄故城的发掘中，有大批冶铁遗址出土，就是证明。据《管子·海王》载：“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铤，若其事立。行服连辔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可见，铁器在齐国的生产与生活中使用已相当普遍。在此基础上，齐桓公时任用管仲为相国，改革内政，“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图谋霸业。在经济上，充分利用本国优越的自然条件，发展农业、渔业生产，推行“相地而衰征”、“井田畴均”的税收政策和土地政策，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还设置盐官、铁官，加强管理，奖励盐铁生产；“通齐国之渔盐于东莱，使关市讥而不征”（《国语·齐语》），积极开展对外贸易，促进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适合于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铸造货币，调剂物价。在政治上，采取“四民分业”的措施，重新整顿了士农工商的户籍，并在用人制度和政治体制方面进行大胆改革，加强了对国内的管理和控制。在军事上，采取“作内政而寄军令”的政、军合一体制，有效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这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实施，使齐国的社会经济日益繁荣，国力很快强盛起来。齐桓公在此基础上，进而对外实行“尊王攘夷”的政策，从而开创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史记·货殖列传》）的局面，成为春秋时期大国争雄中的第一个霸主。

到了春秋后期，虽然齐景公在晏婴辅佐下，使齐国仍保持着大国的地位，但由于奴隶主贵族的残酷剥削与压迫，致使“民人

苦病，夫妇皆诅”（《左传》昭公二十年），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奴隶制度虽经管仲的改革，一度注入了一定活力，但终究不能克服其内在矛盾，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深刻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代表新兴封建势力的田桓子利用减轻剥削的方法，与日趋衰败的“公室”展开争夺民众的斗争，终于赢得人民广泛的拥戴，为夺取姜齐政权做了必要准备。

战国初年，齐国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田氏适时地消灭了旧贵族的大部分势力，完全控制了齐国的政权，以此为开端，齐国社会实现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随着封建政权的建立，整个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封建阶级成了新制度下的统治阶级；奴隶主阶级中大部分没落与败亡，另一部分向地主阶级转化；而奴隶阶级的多数则转化为农民，一部分依然没有摆脱官奴或私奴的地位。事实表明，封建制度的诞生，不会也不可能使奴隶获得全面的解放，只是他们所承受的剥削与压迫形式和程度有所改变而已。因此，当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后，它会程度不等地保留着奴隶制的一些特征，这些也正是封建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但是，封建制毕竟是比较奴隶制进步的社会制度，它能为社会生产开辟更为广阔的发展余地。由于工商业的发展，过去那种“工商食官”的格局被打破了，社会上涌现了大批个体手工业者、私营手工业主和自由商人。在处于社会大转型的时期，有些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也逐步上升为地主乃至新贵，进入统治阶级的阵营。而在封建阶级中，由于来源不同，构成成分十分复杂，又分为许多不同阶层和利益集团。从君王以至庶民，形成了多层次的等级结构，一方面这种结构成为强化封建统治的一种社会网络，另一方面又掩盖着封建统治阶级关系的实质，起着鼓励人们向上爬的作用。它在许多方面显示出优越于奴隶制的特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统治人民，管理国家，巩固封建制度？怎样才能富国强兵，称霸天下？都是摆在田齐政权面前的重大问题。齐威王即位后，为扫除发展封建经济的障碍，巩固与加强统治地位，给其兼并战争创造必要的条件，在邹忌等人的辅助下，进行了封建性社会改革。大体上通过整饬吏治，修明法律，选贤任能，广开言路，奖励进谏，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一系列变法革新，不仅达到了富国强兵、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而且经过桂陵之战、马陵之战及徐州相王等一系列军事外交活动，出现了“齐最强于诸侯”的局面。及至齐宣王时，齐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等各方面，都已成为当时诸侯列国中实力相当强大、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

然而，这时齐国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也逐渐突出起来。到了齐闵王时，其统治集团内部已是矛盾重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都达到了相当尖锐的程度。闵王晚年，对内暴虐无道，堵塞言路，废黜贤良，信任奸佞，政令戾虐，残杀大臣；对外不坚武备而轻举战，“矜功不休”，肆意攻伐，致使国力空虚，兵民疲惫，“百姓不附”，“宗族离心”，“大臣不亲”（《战国策·齐策》），激化了内外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当乐毅率燕、秦、韩、魏、赵五国联军合力攻齐时，终于导致了国破君亡的悲惨后果。

齐襄王复国后，虽苦心经营，但已无力恢复昔日强霸的地位，无法同强秦相抗衡。尤其到了齐王建一代，治国乏术，武备不修，谋士流散，内乱外患交加，国势衰颓，最终败于秦而亡国。曾有过辉煌历史的齐国，至此划上了句号。

二、齐国的文化氛围

齐国在其存在的历史岁月中，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出现了辉煌的业绩，而且也形成了颇富特色的绚丽多彩的文化，在中国学术史、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文化反映着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是人对生存方式与生活方式的一种选择与建构。因而它的生成和发展，总是同一定的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相联系的。就自然条件而言，人是依据所处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等自然条件，来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进行文化创造活动的。越是在人类发展的早期阶段，文化受制于自然条件的影响就越大。不同的自然条件，为塑造不同类型和不同特征的文化提供了外在的物质基础。齐国依山傍海、有渔盐之利等独特的自然条件，是形成齐文化的外在因素。就社会条件而言，齐文化的生成与发展，与其建国前东夷人特定的历史条件与社会传统密切相关。这可以说是形成独具特色的齐文化的内在根据。齐国在其初始阶段，之所以选择了以“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为主的经济道路，正是它所处的特定自然环境与社会历史条件所造成的。由于其水陆交通相对于内陆腹地较为便利，使它能够通过渔盐和手工业制品的生产、营销，同周边国家进行广泛的贸易往来，不仅沟通了齐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联系，而且逐渐形成一种开放意识和开拓精神，比较易于接受新观念，容纳外来文化，从而为造就开放性的文化提供了良好的氛围。

鲁国与齐国则有所不同。它地处内陆腹地，“地狭民众，颇有桑麻之业”（《汉书·地理志》），由于处于丘陵地带，水利条件较差，只

能专重农业，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动不违时，财不过用”（《国语·鲁语》），这一直是鲁国的传统。所谓不违农时，是对农业生产的重视；财货不超过人们的日用消费，是商业不发达的表现。孔子曾批评鲁国大夫臧文仲有“三不仁”，其中的两不仁就是“废六关”和“妾织蒲”（《左传》文公二年）。“废六关”是去掉关禁，以利于通商；臧氏让家人织蒲席出卖，搞了一点副业，在孔子看来都是“不仁”之举，应当查禁。孔子的思想，反映了鲁国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和价值取向。另一方面，鲁国在建国之初用三年的时间“变其俗，革其礼”，全面推行周人的礼乐文化，在其以后的发展中形成了牢固的宗法传统，“尊尊亲亲”的宗法观念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由此形成了一种重礼厚朴的民风，同时也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不易形成较为开放性的文化。

齐国则由于姜太公在立国之初采用“因其俗，简其礼”的治国方策，宗法制推行得不够彻底，嫡庶关系、亲疏等级制度也相对不够严格，因而在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方面就比较开放，禁锢较少。“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国语·齐语》）；“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管子·正世》）的变革创新思想，一直是齐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主流。

在齐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开明的政治家。他们不受血缘宗法制度的限制，尊贤使能，不拘一格重用人才。姜齐时，太公“尊贤智，赏有功”，打破了周人“亲亲上恩”的宗法传统模式。齐桓公任用商贾出身、且有一箭之仇的管仲为相，以出身微贱的鲍叔、宁戚为重臣。齐景公虽然在政治上没有太大作为，但他以“东夷之子”晏婴为相，以“文能附众、武能威敌”的“田氏庶孽”穰苴为大司马。田齐时，齐威王以布衣之士邹忌为相，以受

过臧刑的孙臧为军师，立“赘婿”出身的淳于髡为上卿。齐宣王则为来齐游学的列国学者设“上大夫”之号，“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这都是齐国政治开明、思想解放的极好例证。

与之相联系，齐国还大兴养士之风。齐桓公采纳管仲招贤纳士的建议，“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国语·齐语》）。田齐时，当权者在“诸侯厚招游学”的背景下，不失时机地创办稷下学宫，以更大的规模、更优厚的待遇，广招天下贤士，在与列国激烈的人才竞争中占了上风，使齐国成为人才荟萃的中心。这些人才在齐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种选贤任能、广招贤士的政治措施，深刻影响了齐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

更为主要的是，齐国的当权者推行了一条开明的思想文化政策。姜太公立国时，采用因俗简礼的文化政策，使本土文化（东夷文化）与传入文化（周文化）得以共存并荣，相谐发展。齐桓公设“啧室之议”，凡“人有非上之所过，谓之正士，内（纳）于啧室之议”（《管子·桓公问》），专设一种议政的场所“啧室”，鼓励人们畅所欲言，议论时政。田齐威王下令臣民：有当面提出批评建议的，给予上等奖赏；有上奏章直言规劝的，给予中等奖赏；有在公共场合提出批评意见的，只要传到我的耳朵里，也给予一定的奖励。据说：“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战国策·齐策》）在稷下学宫形成的百家争鸣局面，则是齐国推行开放的思想文化政策的集中体现。

概括地看，齐国的当权者礼贤下士，喜文学游说之士，但不追求单一的思想模式，不强求舆论齐一。他们乐于听取不同意见，对不合己见的思想、学说，非但不加禁止，还积极创造条件，让

其自由发展。他们悉心求治，但不要求学术思想时时处处服从于当权者的要求，只为自己的政令和措施注释、辩护，而是善于采纳、吸收一些有益的思想主张，以便于作出正确的决策，指导自己治国图强的事业。正是这种开放的、宽容的思想文化政策，为文化的多元扩展和繁荣提供了良好条件，使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滨海文化与内陆文化、传统观念与时代精神并存交汇；儒、墨、道、法、兵、刑名、阴阳五行、神仙方术等各家之学，在这里可以争鸣驳难，相互交流，各以其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方式、途径竞相发展。

三、齐学在先秦学术史上的地位

齐国的学术思想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源泉之一，在整个先秦学术史上居于主干地位，是先秦学术思想中主要的组成部分。

第一，它具有悠久的历史 and 传统。齐学孕育于西周之初，成熟于春秋时代，昌盛于战国时期，在长期的传承、拓展、嬗变、演进中发展到极致。自姜太公封疆营丘始建齐国起，就揭开了齐学发展的历史。姜太公的治国思想和军事谋略，为齐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春秋时期，经过管仲、晏婴、孙武等人的补充、修正、发展，齐学已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完备的理论体系；形成了举贤尚功、礼法兼重、刑德相养、王霸一体、农工商并举、义利兼顾的思想传统。由于它能在学术思想领域实行了一种早期民主原则，使它具有涵容性、开放性、进取与求实、改革与创新的思想特征。进入战国时代，以淳于髡、邹衍、田骈等为代表的稷下学者，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各自从不同的方面继承和发展